



馬華文學史百題

方修著

春艺图书贸易公司

065

07

8874

马华文学史百题

方修著

春艺图书贸易公司

马华文学史百题

方修著

出版：春艺图书贸易公司
CHUN YI TRADING CO.
Bukit Panjing P.O.Box 65,
Singapore 916803

题签：陈启汉

封面设计：郑文彬

印刷：South East Printing Pte Ltd

ISBN : 981 - 00 - 8907 - 4

定价：S\$ 6.80 RM 8.80

一九九七年七月初版

目 次

由抗日文学想到的	1
不研读史料，不配谈历史	5
卖柚者也懂得“思想境界”吗？	15
二十年代抄已有艾青风格的诗？	24
肚里空先生现形记	42
从“抗日卫马”谈起	58
文学史问题答客问	63
如何识别特种人物？	87
肚里空先生现形续记	99
反殖作品与“建国意识”	131
后记	141

马华文学史百题索引

1. 马华文学史上何时出现侨民思想与本土意识互争短长? 1
2. 侨民思想何以在抗日时期呈现压倒优势 2
3. 太平洋战争爆发後本土意识何以急速强化? 2
4. 本土意识是否就等於反殖意识? 3
5. 侨民思想可能向反殖意识转化吗? 3
6. "当抗日军是为了保卫中国", 你听过这种天方夜谈吗? .. 4
- (以上见《由抗日文学想到的》)
7. 恶棍小人如何从“垂青”文学史到合组讨伐军? 5
8. 讨伐军何以都对文学史感到不舒服? 5
9. 真实的文学史是怎样写出来的? 7
10. 要占有史料又不肯付出一点代价, 行吗? 8
11. 新老讨伐军那一支比较高明? 9
12. 新讨伐军如何露出特种尾巴来? 11
13. 不研读史料, 靠厚黑学来瞎说“历史事实”, 行吗? 13
14. 上海特种文人领津贴骂鲁迅的事你认为很奇怪吗? 14
- (以上见《不研读史料, 不配谈历史》)
15. 卖柚者腹空无物, 如何谈论“思想境界”? 15
16. 编选铁抗作品何以要提到他的思想问题? 16
17. 《文学机械论》与《悼林仙峤》有何共通点? 17
18. 卖柚者何以痛恨别人谈论思想问题? 19
19. 谈论铁抗思想问题是因为他没有“霍霍红旗”吗? 20

20. 秋瑾、廖仲恺、郁达夫等烈士，都有“霍霍红旗”吗？....	21
21. 大家是不是应该先降一级试试看？.....	23
(以上见《卖柚者也懂得“思想境界”吗？》)	
22. 谁“发现”20年代杪已有艾青风格的诗？.....	24
23. 马华诗人比艾青更早写出艾青风格的诗吗？.....	25
14. 诗行多、篇幅长，就是艾青风格吗？.....	26
25. 你知道世界文学典型人物客里空在大马有个本家吗？.....	27
26. 罗依夫、雷三车的作品是艾青风格的诗吗？.....	27
27. 陈如旧、绿蒂的作品是艾青风格的诗吗？.....	29
28. 三便、清才的作品是艾青风格的诗吗？.....	31
29. 为什么说野火学习艾青最为肖似？.....	33
30. 真正艾青风格的诗何时在新马出现？.....	35
31. 战前马华文学的演变有何特点？.....	36
32. 《夜曲》描写了些什么现象？.....	36
33. 马华诗人也模仿臧克家何其芳的风格吗？.....	37
34. 说柳永是慢词的先驱就等於“独尊”柳永吗？.....	38
35. 要新人的稚嫩呢？还是要老油条的成熟？.....	39
36. 是“华社伟人”有“实质”呢？还是华尔街报业大亨有“实质”..	40
(以上见《二十年代杪已有艾青风格的诗？》)	
37. 马华文学没有支持东南亚区独立斗争的作品吗？.....	43
38. 夏霖笔下的马来水手去了印尼“为什么不回来？”.....	44
39. 马华作家“怎样”支持东南亚区的独立斗争？.....	45
40. 胡一声为什么不能“变成两个新作者”？.....	48
41. 你知道鲁迅和李健吾都曾“变成”好几个“新作者”吗？.....	49
42. “如果论”是谁发明的？.....	51
43. 九字辈的特种作家掴了他师伯师叔多少巴掌？.....	52
44. 为什么说周作人利用鲁迅？.....	53
45. 周作人生前是怎样诅咒鲁迅的？.....	53
46. 不跟反黄运动跑而跟殖民者跑的心态原来古已有之？.....	55

47. 是鲁迅糊涂？还是肚里空对鲁迅太没有认识？	56
(以上见《肚里空先生现形记》)	
48. 三十年代有过“抗日卫马”的口号吗？	58
49. “抗日卫马”的口号有没有“实质”？	59
50. 独立国国民就不会当殖民者代言人吗？	61
(以上见《从“抗日卫马”谈起》)	
51. 为什么有些作家“失踪了”？	63
52. 李汝林、李星可在本地何时开始搞创作？	64
53. 文学史是作家列传吗？	65
54. 史著体例与作家入史人数的多寡有否关系？	66
55. “失踪”的作家写过什么重要的作品？	67
56. 外国文学史著作也有体例的问题吗？	70
57. 史料问题也影响到作家的入史与否吗？	71
58. 依藤、沙风真的“失踪了”吗？	72
59. 真正优秀的作家会长期被埋没吗？	75
60. “几部”大系都对“文学巨人”有成见？	76
61. “肚里空”搞批评需要补些什么课？	78
62. 反黄运动对马来亚没有影响吗？	80
63. 懂一点外国文学史有什么好处？	81
64. 对作家笔名“预先揭发”的告密行为值得鼓励吗？	83
65. 有没有“文坛名家”“怨气过多”、“断气归西”？	84
66. 文学史作者有的是晦气还是“霸气”？	85
(以上见《文学史问题答客问》)	
67. 识别特种人物有何诀窍？	87
68. 特种人物的第一特性是什么？	87
69. 林仙峤为什么出境？因为他参加“乱党”吗？	88
70. 何以有人对于监狱的故事心里有鬼？	89
71. 红毛时代特种监犯为何提早衣锦还乡？	90
72. 何以有人对于反殖作品表现出满腔恨毒？	91

73. 应该谴责鼓励吸毒呢？还是谴责种族成见？	92
74. 种族事件不是跟着“独立国国民”的“尾巴”来的吗？	93
75. 特种人物如何先意承志主动丑表功？	94
76. 马华作家也有争吃子孙饭的吗？	95
77. 争吃子孙饭就“一定不会亏本”吗？	97

（以上见《如何识别特种人物》）

78. 中国左翼作家几时喊过反侵略反封建的“口号”？	99
79. “毛润之”几时发过反侵略反封建的“指令”？	100
80. “反侵略反封建”的真正出处何在？	101
81. “反侵略”在不同时期有何不同内容？	102
82. 本地也有唐吉珂德大战风车的故事吗？	103
83. 马华文学究竟有没有反侵略的作品？	104
84. 老殖民者卷土重来就不算侵略、不应反对吗？	107
85. 移民社会就没有封建可反吗？	107
86. 移民社会的反封建作品知多少？	110
87. 五、六十年代的华社不是还有大把封建可反吗？	111
88. 文学史没有提1947年的罢市行动吗？	112
89. 紧急法令初期马华文学“生机蓬勃”吗？	115
90. 日占时期马华文学比其他任何时期都繁荣吗？	116
91. 文学史是丛书出版史吗？	116
92. 《南洋报社丛书》是不是文艺性的？	118
93. 文学史只字“不提”南洋报社出版的书吗？	118
94. 温梓川诸家真的“不曾存在过”吗？	119
95. 特种牌的政治标签是怎样来的？	120
96. 作家作品的介绍有没有一定的标准？	121
97. 特种“现形秀”何以屡次同一模式？	122
98. “向色情生活方面找题材”的说法不合事实吗？	123
99. “反映次要问题”的提法有错吗？	124
100. 独特性问题的论争是两党政策之争？	125

101. 胡愈之救得了肚里空先生吗?	126
102. 独特性问题的论争究竟是怎样引起的?	127
103. 马华文艺自立运动有没有“衔接不上”的现象	128
104. 谁够资格当独特性问题论争的“人证”?	129

(以上见《肚里空先生现形续记》)

105. 马华文学的反殖历史是不是比许多政党更长久?	131
106. 为什么有人谈文学史需要窜改引文和偷换概念?	133
107. 1949年以前果真没有建国意识的作品吗?	134
108. 何以见得早期马华文学不乏建国意识的作品?	135
109. “建国意识”作品所在多有, 牙擦仁兄何时承认无知?	137
110. 早期马华文学“凭什么”会有建国意识的作品?	139

(以上见《反殖作品与“建国意识”》)

111. 文艺虫豸靠什么气候冒出来? 有什么拿手好戏?	141
112. 讨伐军利用那些阵地来跃马横戈?	142
113. 为什么要写《马华文学史百题》?	143
114. 写《马华文学史百题》是不是太不值得?	144
115. “马华”、“新马”, “新华”涵义有何不同?	145

(以上见《后记》)

由抗日文学想到的

《赤道风》准备为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出个特辑，主编先生要我也写篇东西来凑凑热闹，我由此联想到文学史上的抗日文学时期，想到有关马华文学史的若干小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写一点的。现在就随想随写，随便谈谈。

马华文学史上何时出现侨民思想 与本土意识互争短长？

我曾告诉关心马华文学的朋友们说，马华新文学——即马华现代文学——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马华文学的自立运动史。早在它的发轫阶段，马华新文学就已经出现了侨民思想和本地意识两股力量的争锋。本地意识初时十分微弱，可谓处于萌芽状态。但是随着时代脚步的迈进，却就渐渐地强化起来。1947、48年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是本地意识开始反客为主的转捩点。1953年反黄运动兴起以后，本地意识就完全取得支配的地位了。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能一刀切地加以分割为两半，说战前的马华文学是侨民文学。这样说是把事物的丰富内容简单化、机械化的偷鸡、取巧的作风，不是真正的做研究的态度。

所谓从量变到质变，也还是比较粗略的讲法。实际上，马华文学自立运动的过程是更加错综复杂的。就战前这一大段来说，侨民思想是较占优势的。但也不是始终保持着领先的势头。它和

本地意识两者不断地发生此消彼长、交替起伏的变化。我曾发现这么一个规律：每逢中国发生大事件、大动荡、或者民族危机特别严重的时候，侨民思想就大占上风；遇到没有大事件、大动荡发生，或者是本地的社会现实反而更值得一般华人关注的时候，本地意识就比较突出。例如，五四至北伐时期，中国政局动荡不安，成为本地多数华人视线的焦点，因此文学作品中的侨民思想相当浓郁。1929年到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大萧条，新马工商业受到严重打击，人民失业浪潮汹涌，现实社会问题更加令人注目，所以本地意识相对抬头，产生了大批尖锐地反映本地现实的新兴文学作品。接着，又有“地方作家”问题的论争，“马来亚本位”概念的形成，“马来亚新文学”口号的提出……。这些都标志着本地意识的不断加强。

侨民思想何以在抗日时期呈现压倒优势？

与上述的规律相符，马华抗日文学时期，正是侨民思想显出压倒性强势的时期。因为当时再也没有任何事物比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问题更为牵动人心的了。那时候的一般热门作品，从描写前线的浴血战斗到反映本地的卖花筹赈、锄奸抵货的活动，几乎都是服务于中国抗日救亡大业的。但尽管如此，本地意识也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暗流潜涌，激荡不已。这反映在报刊上不时出现一些文章大力的强调“地方性”、“现实化”，强调注重本地社会实践、运用当地资料来研究问题、讨论问题；也就是坚持从“本地”的角度或现实主义精神出发来看事物、搞创作。这些文章自然也是抗日文学，但与当时流行的富于侨民思想的作品比较，显然有点不同，它们具有一定的本地意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本土意识何以急速强化？

到了抗日文学末期，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进，由于“抗日卫马”的号召，本地意识就急速地提高。新加坡保卫战期间一

两个尚未停版的报章副刊以及某些青年团体的油印刊物，都有人撰文表示反对文化人出走，力主大家留下来做抗日工作。

不久，新马完全沦陷，晋入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与侵略者短兵相接的阶段，本地意识于是显得更加鲜明。从沦陷时期遗留下来的少数诗作、短文或抗日歌词，都可以见出这一点。这现象也是不难理解的。见识了殖民者平日对人民作威作福、一旦风吹草动就把人民甩掉，逃之夭夭的那种贪婪自私的本性之后，稍为有点志气的人，谁不希望由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呢？

本土意识是否就等于反殖意识？

也许应该说明几句，我所说的早在马华现代文学发轫期间就已出现，而且一直与侨民思想在互争短长的本地意识，当然不等于反殖意识，但也包容了反殖意识，也就是说，本地意识未必就是反殖意识，但也有可能是反殖意识，至于早期的具有本地意识的作者，则有两大类。一类是土生土长，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或者是去中国读了书又回来的。另一类是年纪很小就从中国南来，在本地学习、工作，成长起来的。因此本地意识也可以说是“土生意识”，或者是具有在本地扎根的思想倾向。

侨民思想可能向反殖意识转化吗？

另一方面，所谓侨民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永远一个状态的。一个本来有着一定的侨民思想的作家，在某种情形之下——譬如他深入了生活；认识了殖民地社会的丑恶、同情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决定为本地做一点事情之后，他的侨民思想是很可能淡出，让位给本地意识、甚至反殖意识的。（这就是一些被称为侨民作家者，也常有为了反殖而被驱逐出境的原因。）

以上或类似的话，我在一两篇旧作或访谈录中，记得也曾说过一部分。

“当抗日军纯粹是为了保卫中国”，你听过这种天方夜谈吗？

但近年有一种新发明的、超凡出众的论调，说华人参加抗日军，大多“纯粹”是为了保卫中国。这却是十分高深奥妙的道理，我闻所未闻，也无法欣赏。

在新马人民成立抗日军、建立抗日根据地之日，正是日军占领了新马、实行血腥统治、到处烧杀掳掠之时。那一段时日，从新加坡、文律、峇株、麻坡、芙蓉、吉隆坡……到槟城，冤死者以十万、二十万计，许多地方血流成河，鬼哭神号。还有横征暴敛、强制劳役等措施，华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华人参加抗日军，竟然不是为了复仇，不是为了近在眼前的活命问题，不是为了把强盗赶出惨遭蹂躏的自己的甘榜与胶园，不是为了挣脱奴隶的枷锁、希望自己能够当家作主；而是“纯粹”为了“保卫”远在天边的“中国”；这种新发明的天方夜谈，倒是太适合殖民主义者的口味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廿三日稿）

不研读史料、不配谈历史

恶棍小人如何从“垂青”文学史到合组讨伐军？

SD先生：

寄来剪报两张，收到了，感谢您的关心！

来信说：“近年来文坛猛吹怪风。文棍们纷纷要给自己定位，糊涂平庸的也瞎起哄。这些都对真实的历史没甚么影响。搞文化工作但求心之所安，对后代有个交代。其他荣辱得失也不算什么了。方先生在晚年还受到文坛恶棍的‘垂青’，其实也说明您的论著使得势者感到不舒服，不必为这些小人而生气……”。这一段话，我觉得还可以做些补充。

早在开始整理马华文学史的时候，我就已经受到恶棍和小人的“垂青”了。现在虽然到了晚年，但只要恶棍没有死光，小人继续得志，再度受到“垂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看来，恶棍小人而外，“垂青”者恐怕尚有人在，或许济多士也说不定。早年，我已见过不少你所谓的“瞎起哄”的糊涂者，晚年遇到的则多了一些山歌明星、卖柚者、特种作家及其志同道合者，品类可谓颇杂。因此，对我“垂青”的人士，似乎可以笼统地称为讨伐军。早年我面对的是老讨伐军，晚年幸会的是新讨伐军。

讨伐军何以都对文学史感到不舒服？

新老讨伐军为什么都对我特别“垂青”呢？我想可能真的是

由于我的论著使他们“感到不舒服”的缘故。至于何以会“感到不舒服”，则是因为我的论著写出了历史的真实。真实是多方面的，最使他们“不舒服”的是，我的论著没有根据一向来的传说把本地文学的发展史一刀切，人云亦云地说战前的马华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支流或侨民文学，战后或五十年代以后的才是真正的马华文学；也没有以讹传讹地说战前的马华作家是侨民作家，战后或五十年代以后的才是真正的马华作家；或者说战前没有反殖的作品，战后或五十年代以后才有反殖的作品……

恰恰相反，我的论著始终明确地指出，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华文学的自立运动史。它一开始就出现了侨民思想和本地意识两股力量在互争短长，在交替起伏。总体上说战前一段时日是侨民思想略占上风，战后则是本地意识渐渐反先；到了五十年代反黄运动兴起以后，本地意识就完全取得支配的地位了。这整个过程是一个从渐变到突变的过程，根本无法分割开来。至于所谓“中国文学的支流”，那完全是捕风捉影之谈。“侨民文学”的说法倒是有点根据的，但“侨民文学”并不就等于“中国文学的支流”；一般上指的是一种带有侨民思想的作品，那是马华文学的一翼，包括在马华文学之内的。这就是说，马华文学一开始就有两大系列作品，其一是具有侨民思想的作品，其二是属于本地意识的作品。它们都是马华文学，两者平行发展，其间有升有降，有消有长。

我的论著也常常指出，本地作家的反殖意识，早在马华现代文学的萌芽期（1919--1925）已经滥觞起来。二十年代后期勃兴的新兴文学，就有了色彩鲜明的反殖作品出现。（新兴文学运动时期是1927--1931年，比较成熟的作品则多见于1929和1930两年。）

我的论著同样明确地指出，一些被称为“侨民作家”者，多有他们的两面性。既有去国怀乡、心切中原的一面，也有支持本地反殖运动、为英国人所不能容忍的一面。侨民反殖并没有什么

奇怪，侨民的身份并不能阻止他们为当地人民作出一点奉献。中国抗日时期，不是有许多外侨在中国参与反侵略运动吗？

这些话都是使到新老讨伐军“感到不舒服”的，因为他们也都是上述的“战前是侨民文学，战后是马华文学”之类滥调的传播者。新讨伐军里面的一两支大斧队，对于我的论著尤其恨得咬牙切齿，誓非灭此朝食不可。因为要是承认战前一早就有反殖作品，那不是证明殖民者当时统治下的并非什么王道乐土了吗？万一红毛降罪下来，特种事业就不好做，更不必说到表功邀宠了。而且，承认了战前一早就有反殖作品，这又证明了反殖的先驱者一早就大有人在，轮不到他们这些“当代英豪”来舞大斧、丑表功了。

真实的文学史是怎样写出来的？

现在要问，我的论著又何以能够写出历史的真实来，从而纠正一向来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说呢？

这原因在于我肯下点死工夫去泡史料，找史料，影印史料。

我所编著的马华文学史，迄今为止，共有两大段落。一是战前的二十三年：1919--1942。另一是战后初期的十一年：1945--1956。为了写这两大段落的历史，我把本地一两家图书馆所庋藏的有关报章的副刊都翻看了一遍，战前的一段甚至看了两遍以上。看的同时，我也做了不少抄写、摄影——即搜集史料的工作。在当时来说，没有第二个人舍得花那么大量的时间去和这一大叠、一大叠的旧纸堆作伴、舍得付出那么多的精神和物质的代价去从事这方面史料的搜集。

此外，各图书馆未曾收藏的报刊，我接触到的也有相当数量。属于战前的，有吉隆坡的马华日报、新国民日报、槟城的现代日报等。当时我住在吉隆坡，这些报章的文艺副刊正是我每日的精神食粮。还有吉隆坡的《中马文艺》、吡力州的《实报》、槟城的《现代周刊》等杂志，我当时不但是它们的忠实读者、长

期定户，其中有一两种还是我给跑龙套，帮忙校对的。这些中北马的报刊，新加坡的读者一向少有机会见到，本地图书馆没有收存是可以理解的。（大马的一两个图书馆或博物院，也许会有些皮藏？）

至于属于战后初期者，报章方面有吉隆坡的民声报、战友报、槟城的现代日报，杂志方面有吉隆坡的《洪流》、《民声周刊》、《文化月刊》，彭亨州的《东彭丛刊》，槟城的《现代周刊》，新加坡的《风下》、《大地》、《群众》、《人民周报》、《新流》、《新时代》、《青年周刊》等二三十种。那时候我因为从吉隆坡移居到新加坡，又得以在一个偶然的补看了本地战前的几种重要刊物：《南洋周刊》、《朝阳》、《忠言》。不消说，上述的大批报刊，或因不在新加坡出版，或因不被有关方面重视，本地图书馆的藏书里也是绝大部分付之缺如的。但对于它们，我却是从形式到内容至今都还历历在目。这里面有没有反殖作品，我比任何一个当时还在母亲肚子里待产的特种人物更加清楚。

因此，在六十年代初期——也即我开始编写战前和战后初期这两段马华文学史期间，我是较有条件来做这项工作的一个人。我的编著是建立在上述的一批博大而坚实的史料的基础上的。我对于有关史料既有理性的审视，也有感性的认识，这更是我这一代人编写现代马华文学史的独有的一个特点。我因限于时间、限于能力，这两大段历史都写得不好，这是事实。但我写出了真实的历史，却是新老讨伐军“一百篇”、“一千篇”骂人的文章都无法加以推翻的。

要占有史料又不肯付出一点代价，行吗？

其实，讨伐军也不是不想收集一点史料，只是他们的做法不当。先说老讨伐军，他们舍不得多花一点时间与费用去抄写旧报刊或拍摄稿照（六十年代前后复印设备还不普及），偏喜欢急功